

中國時報 / 2001/06/18

## 小劇場與文化轉向

【林克歡】

十年前，王墨林語出驚人：小劇場死了。但此後，他本人又在死了的小劇場中客串演出。我關注的不在於「黑洞」之類演出，能否以類宗教的救贖希望替換終極真理的位置，也不在於它是否呈現了演出者自我意識晦暗失落的悲情，而在於一個對所有遠離生活現場的藝術持嚴厲批判態度，狂熱鼓吹社會行動劇的理想主義者，轉而向小劇場尋求個體生命情愫釋放的隱喻性意義。

在這個下課鈴早已敲響的後革命時代，X世代、Y世代年輕人不再相信聖壇與課堂的宣教，適意即可大行其道，燈紅酒綠的文化放縱與消費取代了對意義的追尋。小劇場工作者完全失去戰鬥的對象，落得比唐吉訶德還尷尬的境地。至少唐吉訶德還有風車可以戰鬥，小劇場工作者如今茫然四顧，連風車也不見蹤影。

對海峽兩岸的小劇場工作者來說，八〇年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泛政治化時期。由於與世界藝術發展的時間差，大陸在文革結束、門戶乍開的改革初期，包括小劇場在內的戲劇演出有過一段短暫的繁榮歲月，高行健、林兆華的「絕對信號」，王培公、王貴的「WM」，著實讓人們興奮了好一段日子。透過對新的空間形式、新的觀演關係的探索，賦予了劇場空間濃厚的政治意涵，將對傳統劇場空間形式的質疑與揚棄，提升為對傳統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觀念的變革要求。

台灣在解嚴前後，小劇場運動風起雲湧，青年學子將劇場作為陳述政治訴求的場所，火山爆發般釋放出被壓抑多年的生命能量，蘭陵劇坊、田啓元成為媒體的寵兒，戲劇活動第一次在台灣社會生活中佔有如此醒目的地位。

香港的小劇場活動比較特殊，除「進念」榮念曾這個劇場異數以形式化、裝置化和政治質詢八十年代初在演藝圈引爆一枚炸彈外，幾乎所有較有思想、情感深度的作品都是在「九七」回歸前夕才湧現出來。在回歸和政權轉移這一無可逆轉的大情勢下，歷史之謎，家國之思，切膚之痛，引發了對香港人身份的質疑與香港文化定位之迷思，無論是劇場中講述之故事與故事之講述，都作為香港意識建構的一部份而引起人們的重視。

如今，時過境遷，昔日的輝煌已成為歷史。出於一廂情願的歷史熱情所建構的藝術聖殿，在不斷的文化轉向中，恰恰成了安放歷史神話的寢宮。歷史的嚴酷性正在於，它在埋葬舊霸主的同時，也埋葬了掘墓者。

其實，藝術不會終結，歷史也不會終結。終結論嚴重地限制了人們對歷史發展的預測與想像。詹姆遜（Jameson）說得好，「歷史的終結」只不過是福山（Fukuyama）對全球化發展的焦慮。可以說，「歷史的終結」只是「前歷史」的終結。

在這個無論你將其稱為後現代、晚期資本主義或全球化消費、信息時代，文化正在與經濟逐漸重疊。藝術將卸下總體性，目的論的沉重外衣，拭去宗教與哲學的最後殘跡。藝術、藝術工作者的功能、身份也免不了要被經濟與商品所定位。

我深信，一種藝術的衰退必然與另一種藝術的興起緊密相關。真正值得重視的是，藝術（包括小劇場）工作者如何面對這迫在眉睫的文化轉向與職能轉換。

（本文作者為北京中國青年劇院院長）